

*A Study of
Greenblatt's New Historicism*

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研究

朱 静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A Study of
Greenblatt's New Historicism*

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研究

朱 静/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杨美艳 刘 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研究/朱静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6
ISBN 978 - 7 - 01 - 014745 - 1

I . ①格… II . ①朱… III . ①现代文学—历史主义—文学理论—
文学研究—美国 IV .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69280 号

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研究

GELINBULATE XIN LISHIZHUYI YANJIU

朱 静 著

人 民 大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5.25
字数:200 千字

ISBN 978 - 7 - 01 - 014745 - 1 定价:3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本书作者朱静博士给我的印象有两个,第一是英语特别好,第二是做事扎实。有人会说,朱静从本科到硕士,都在英语专业就读,英语好是应该的。然而,我也接触过一些本科与硕士都是英语出身的人,不但说英语的时候发音有问题,而且写英文文章也很困难。记得在朱静毕业前夕,我办了一次比较文学国际会,由于她英语好,做事又认真负责,因此我叫她负责国外学者的接待,她做得极为周到与扎实,最后差点将自己累倒。

研究国外文学思潮与理论的著作,最怕的有两个:第一是由于外语基本功不行,在自己的著述中将国外的文学理论翻译得走样;第二是做学问不扎实,甚至以国外的文学理论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一点不顾及研究对象所处的国情。由于朱静博士避免了上述两点,从而保证了本书的学术质量。可以说,本书是国内研究新历史主义最有学术分量的专著。

我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两个专业培养博士研究生,面对的是两个知识背景完全不同的群体:一个是从本科到硕士都是学中文的,另一个是从本科到硕士都是学外文的。考虑到语言能力在研究中的重要性,我认为他们在选择博士论文的题目时应各有侧重:一般来说,我要求学中文的学生选择比较文学作为研究对象;要求学外文的学生选择世界文学作为论文题目,以便发挥其语言优势。而且我认为,研究外国文学的,所学语种基本决定了所选国家的范围,比如,学英语的绝无可能选择法国文学为

题；在文学与文论之间，优先选择文论。朱静最终的选择是英语文论——以新历史主义为题。

我对朱静的选择加以鼓励。当时西方文论中的各种主义正冲击中国学坛，相对而言，格林布拉特和他的新历史主义并非学界讨论的热点，而且显得似乎有点过时。然而就学术研究而言，只有当一个学术流派落潮的时候，才可以对其来龙去脉加以寻根究底，所谓“当代无史”也就是说的这个道理。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来，朱静的论文可谓恰逢其时。她在论文中对新历史主义的学术渊源与新历史主义落潮之后的学术发展，都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对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格林布拉特，则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尤其是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的中国，新历史主义的研究更为重要。黑格尔大概是哲学史上最强调历史观念的哲学家，而马克思主义受黑格尔的影响，也强调历史的观念而反对非历史主义的形式主义。那么，当流通、塑形、社会能量等概念进入新历史主义后，新历史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又有哪些异同？朱静对这些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朱静博士答辩的评委杨慧林、王宁、刘象愚、陈永国等都是当代中国著名的外国文学理论家，他们对朱静的博士论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朱静在攻读博士学位之前是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教师，以其在博士论文中表现出来的才华，在北京找个好工作并非难事，但她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又回到保定，为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效力，并且以博士论文为基础成功申报了教育部人文社科的青年基金项目。2013年1月到2014年1月，她在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下来到了格林布拉特所在的国度——美国，在康奈尔大学比较文学系师从著名的新历史主义学者 Walter Cohen 教授和莎士比亚研究专家 William Kennedy 教授。这对她的项目的完成——在博士论文基础上的改写与提高，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带着镣铐跳舞”的诗人文闻一多、徐志摩、朱湘，写出了现代中国最优秀的诗歌；而“带着镣铐跳舞”的青年学者朱静，写出了国内第一部运用英语材料全

序

面、系统、深入地研究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格林布拉特的专著,因而本书也是填补学术空白之作。

高旭东 2015年2月18日羊年除夕于北京天问斋

目 录

序	1
绪 论：格林布拉特与新历史主义	1
第一章 新历史主义概说	14
第一节 新历史主义的缘起和发展	16
第二节 新历史主义的智性资源	33
第二章 成为格林布拉特	48
第一节 塑造格林布拉特	50
第二节 格林布拉特的批评实践	64
第三章 文化与文化诗学	85
第一节 从文化到文化诗学	86
第二节 实践文化诗学	98
第三节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形式主义	107
第四章 重塑英国文艺复兴的自我	113
第一节 用文化诗学重塑文艺复兴的自我	114
第二节 作者的自我塑造	120

第三节 虚构角色的自我塑造	130
第四节 重塑自我的悖论	142
第五章 社会能量的流通	148
第一节 社会能量	149
第二节 社会能量在莎士比亚中的流通	162
——以《莎士比亚与驱魔师》为例	
第六章 颠覆与遏制	177
第一节 权力的颠覆与遏制	178
第二节 检验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	195
——对《隐形的子弹》的重新思考	
结语 新历史主义之后	212
主要参考文献	221
后记	233

绪论：格林布拉特与新历史主义

新历史主义(the New Historicism)崛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美国，以其对形式主义和旧历史主义的双重反叛，很快在英国文艺复兴或现代早期(early modern)、尤其是莎士比亚研究领域，掀起了一场范式革命。一方面，它反对把审美形式从物质领域孤立出来的做法，拒绝艺术与历史的隔离，而把它们视为相互交叉和相互组成的领域，坚持文学既是由社会生产又生产社会，从而与形式主义划清界限；另一方面，经过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种理论运动尤其是后结构主义运动的洗礼，它拒斥历史的客观性、总体性和目的性，坚持历史的建构性和阐释者自身的局限性，从而又与旧历史主义相区别。新历史主义虽然最初是在莎士比亚和英国文艺复兴领域兴起，但却具有广泛的跨学科性。在过去近30年的时间里，它的影响早已经超出莎士比亚和英国文艺复兴领域，成为美国文学研究中主导的批评运动之一；而它的批评旨趣、方法等，也从文学研究渗透到艺术、建筑、仪式、宗教和文化等其他领域，深刻地影响了这些领域的研究。

斯蒂芬·J.格林布拉特(Stephen Jay Greenblatt, 1943—)作为这场持久而又影响深远的批评运动的命名者、积极推动者和最重要的实践者，几乎是新历史主义的代名词。2000年，继希拉里·普特曼(Hilary Putnam)之后，格林布拉特成为哈佛大学新一任的人文学科约翰·科根校级教授(John Cogan University Professor)。在宣布这一消息时，当时的校长内尔·鲁登斯汀(Neil Rudenstine)曾这样评价他：“在塑造过去四分

之一世纪文学研究和批评的方向上,没有人比格林布拉特做得更多。”^①这话虽然有夸张与恭维的成分,但离事实也不是很远:在当今的文艺复兴研究领域尤其是莎士比亚研究领域,确实很难想象有谁比格林布拉特更具影响力。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几乎所有研究现代早期英国文学和文化的人都不可能忽视他的研究。

格林布拉特虽然是新历史主义运动的命名者,但他对新历史主义最重要的贡献,却不在乎明确地为这一运动提出了什么基本的理论或方法。相反,他一直不太愿意做理论总结,认为“不可能有单一的方法和总体图景,也不可能有可穷尽和可确定的文化诗学”。^②他对这场批评运动最重要的贡献,首先在于他本人几十年的批评实践。可以说,正是由于他在莎士比亚和英国文艺复研究领域那些具有原创性和代表性的著作,新历史主义才可能有现在的影响力。而且,格林布拉特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批评家,在批评实践中,他能始终不断地在别人的批评和新的证据的启发下修正自己的观念,以保持新历史主义和文化诗学持久的活力。而除了本人的批评实践之外,格林布拉特还不遗余力地为新历史主义运动的发展推波助澜。他从 1983 年开始主编加州大学出版社的“文化诗学”系列丛书,到 2009 年系列完成时,已经出版了 34 部专著。同时,他还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同事共同创办了新历史主义的旗舰刊物《再现》(*Representations*),如今它仍然是美国主要的文学研究期刊之一。他参与的另一项重要活动,是主编诺顿莎士比亚全集和诺顿英国文学选读。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开始,这些带着明显新历史主义旨趣倾向的文集,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大学中流通和普及,其影响力迄今还都无法估量。

不过,虽然格林布拉特很少直接提出提纲挈领的理论视角,但他的一

^① “Greenblatt Named University Professor of the Humanities”, *The Harvard University Gazette*, September 21, 2000, <http://www.news.harvard.edu/gazette/2000/09.21/greenblatt.html>.

^② Stephen Greenblatt, *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s: The Circulation of Social Energy in Renaissance Engla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reprinted 1997, p.19.

些原创性思想和术语，如自我塑造、社会能量的流通等等，如今已被众多批评家所采用。他一直关注的，都是文学和文化批评所面临的最关键和最意义深远的问题；而他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对文学和文化批评家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包括那些可能并不把自己视为历史主义者的批评家。所有这些，都使格林布拉特成为我们考察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莎士比亚和现代早期研究、甚至整个美国文学研究时，一个无法绕开的名字。

一、国内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一) 国外对新历史主义及格林布拉特的研究

虽然新历史主义运动的影响不仅仅限于美国和英国，在德国，也有许多从事类似研究的学者，如罗伯特·威曼（Robert Weiman），但是本文还是将其视为主要发生在英美文学研究中的一场运动，对格林布拉特的研究也以此为背景。所以，文献综述将以英语世界为主。

作为一种文学批评实践，英语世界对新历史主义的研究可以说是伴随着它的整个的发展历程。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新历史主义影响的日渐增大，英美学界开始迅速出现大量著作、文章、会议和讨论，中心的话题就是这一领域的新发展。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初期的著作大多都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现，多以综述为主，似乎批评家们还没能与新历史主义进行批评和理论的对话。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这一情况开始改观，陆续出现了对新历史主义和格林布拉特的批评实践进行理论性反思的著作，且不乏专著。这些文集和专著以及大量评论文章，将新历史主义从理论上和时代上加以语境化，从不同侧面勾勒出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假设、思想资源、批评方法、特点、其成功之处及面临的困境等。进入 21 世纪之后，在新的研究趋势和兴趣的语境下，批评家们又开始回望新历史主义，评估其对文学研究的影响，并试图描绘“新历史主义之后”的图景。

1. 对新历史主义的研究

1989 年，在新历史主义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H. 艾拉姆·威

瑟(H.Aram Veeser)主编的《新历史主义》(*The New Historicism*)出版了。在威瑟看来,新历史主义“虽然把对批评的自我审视看成是必须的”,但在当时,“还没有出现对这一批评倾向的方法及其含义的系统讨论”,因此这部文集的出版可以说是“恰逢其时”。^① 文集收录的文章,就新历史主义的谱系、方法和政治,从各种批评角度和跨学科角度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和论争,反映了新历史主义的异质性和内部的斗争性。虽然文集并没有实质性地理论化新历史主义的方法,但无论如何,这部文集成为后来的新历史主义研究者的必读书目。威瑟在导言中认为,虽然新历史主义是一个“没有恰当指涉的词汇”^②,但还是有五个关键假设把各种异质的批评联系在一起:文本的文化根植性、任何批评都有可能陷入自己批判的对象的陷阱、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相互流通、没有文本通向不变的真实、资本主义文学需要资本主义诗学。^③ 五年之后,威瑟再次编辑了《新历史主义读本》(*The New Historicism Reader*)。他在导言中重申了上述五点,同时回应了一些对新历史主义的攻击,指出了新历史主义内部的分裂,对新历史主义未来的走向做了预测。

同样试图对新历史主义做总体回顾的,是被视为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家”的路易斯·A.孟特罗斯(Louis A. Montrose)。1992年,格林布拉特和吉尔斯·甘(Giles Gunn)主编了《重新划界:英国和美国文学研究的巨大变》(*Redrawing the Boundari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一书,意在考察近来英美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发展。孟特罗斯撰写了其中的《新历史主义种种》(“New Historicisms”)一章。他概述了新历史主义批评实践的主要关注点,并重申了关于新历史主义的“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的定义。针对当时对新历史主义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评,尤其是其“遏制”、“意识形态统治”和“颠覆”的假

① H. Aram Veeser (ed.), *The New Historicism*, London: Routledge, 1989, pp. viii–ix.

② Ibid., p. x.

③ Ibid., p. xi.

设，孟特罗斯都从自己的角度作出了回应，同时还讨论了福柯（Michel Foucault）、吉尔兹（Clifford Geertz）与后来的新历史主义实践之间的连续性。

新历史主义批评实践的文集在 1980 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很多，如吉恩·E·霍华德（Jean E Howard）和马里奥·F·奥坎纳（Marion F.O'Connor）编辑的《重新生产莎士比亚》（*Shakespeare Reproduced*, 1987）、理查德·威尔逊（Richard Wilson）和理查德·达顿（Richard Dutton）主编的《新历史主义与文艺复兴戏剧》（*New Historicism and Renaissance Drama*, 1992）以及由特伦斯·霍克斯（Terence Hawkes）任总主编的《另类莎士比亚》第一、二卷（*Alternative Shakespeares*, Vol.1 1985, Vol.2 1996）等。这些都是对文艺复兴和莎士比亚研究中的新历史主义倾向的一个回顾。

英国的文化唯物主义（Cultural Materialism）是与新历史主义平行的批评运动，它们之间共享很多理论假设和方法，但也存在着一些区别。乔纳森·多利莫尔（Jonathan Dollimore）和艾伦·辛菲尔德（Alan Sinfield）在他们主编的《政治的莎士比亚》（*Political Shakespeare*, 1985, 1994）中提出，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之间主要的不同在于，新历史主义在文艺复兴文学中更多地发现了遏制的力量，而文化唯物主义则更多地发现了颠覆的力量。^① 而对二者之间异同的详细论述来自约翰·布兰尼根（John Brannigan）。他在其专著《新历史主义与文化唯物主义》（*New Historicism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 1998）中探讨了它们的历史渊源，介绍了具体的批评手法，分析了它们在基本理念上分歧。在他看来，虽然二者在初期的理论和批评实践上有诸多相似之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理论和实践的演变，二者的区别日益显著。新历史主义着重于考察文本中权力的体现及其功能，关注权力是如何遏制一切潜在颠覆的；而文化唯物主义的

^① Jonathan Dollimore and Alan Sinfield (eds.), *Political Shakespear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1994, pp.2–3.

侧重点正好相反,它在文本中搜寻颠覆因素是如何抵制权力。新历史主义重在描述权力在历史上的运作方式,而文化唯物主义则专心探究颠覆力量在当前的可能,表现出更强烈的政治介入的愿望。布兰尼根还在书中暗示,这种分歧主要来自于各自的思想来源和知识背景。新历史主义的理论资源包括福柯的权力理论、阿尔都赛(Louis Althusser)的意识形态理论、吉尔兹的文化人类学等。而文化唯物主义则更多地受益于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与福柯、阿尔都赛的悲观论调相比,威廉斯的理论更多地带有战斗色彩,为文化唯物主义定下了更加乐观基调。

在新历史主义的理论资源方面,布鲁克·托马斯(Brook Thomas)的专著《新历史主义及其他过时话题》(*The New Historicism and Other Old-Fashioned Topics*, 1991)对新历史主义所受到的之前的历史主义(Historismus)和后结构主义的影响以及与它们的不同进行了概括,从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所谓的“新”历史主义,可能只是一些老话题的继续。克莱尔·科尔布鲁克(Claire Colebrook)在《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ies: New Historicism and Contemporary Criticism*, 1997)中则梳理了新历史主义同福柯、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威廉斯、阿尔都赛、马歇利(Pierre Macherey)、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关系,同时也探讨了新历史主义与文化唯物主义的异同。保罗·汉密尔顿(Paul Hamilton)的《历史主义》(*Historicism*, 1996)虽然不是专门论述新历史主义的,但对“历史主义”的历史、用法进行了追踪,试图厘清围绕这个术语的诸多含混之处。

除了这些文集和专著,大量期刊文章对新历史主义的讨论也是不可忽视的。这些都在威瑟主编的《新历史主义》中孟特罗斯的文章《文化诗学与文化政治》(“Professing the Renaissanc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Culture”)后的注释7,以及本书后的参考文献中列出,在此不再赘述。

2. 对格林布拉特的研究

由于格林布拉特是新历史主义最著名的实践者和倡导者,因此几乎所有对新历史主义的讨论都会涉及他。比如在上面提到的《新历史主义及其他过时话题》、《新文学史》这两本专著中,作者都辟出专章来讨论他的批评实践、他与新历史主义的关系等。于根·彼得斯(Jürgen Pieters)是近年来对格林布拉特进行过专门研究的学者之一。他主编的《批评的自我塑造: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和新历史主义》(*Critical Self-Fashioning: Stephen Greenblatt and the New Historicism*, 1999)主要收集了欧洲学者对格林布拉特和新历史主义的论述,包括文学与文化理论家、莎士比亚专家和文学史家。他们从跨学科的角度对格林布拉特的著作进行了审视,将他的写作与德赛托、吉拉德(René Girard)、维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等理论家的进行相互参照和比较。除了编辑以格林布拉特为主题的文集,彼得斯还在其专著《商讨时刻: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Moments of Negotiation: The New Historicism of Stephen Greenblatt*, 2002)中,对格林布拉特所开创的新历史主义的阅读方法进行了深度分析。彼得斯试图填补对格林布拉特思想资源研究方面的空白,因此在书中对格氏批评方法的理论背景进行了全面分析。他不仅对格氏的思想资源[包括巴赫金(Mikhail Mikhailovich Bakhtin)、福柯、阿尔都塞、马歇利、德赛托、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威廉斯和霍尔(Stuart Hall)等]进行了细读,还批判地审视了他是如何将他们原创性的洞见变形后放到自己的跨学科方法的框架之内。

2005年,米歇尔·佩恩(Michael Payne)编辑出版了《格林布拉特读本》(*The Greenblatt Reader*)。格林布拉特在文化、文艺复兴和莎士比亚研究领域最重要的作品第一次被收录在一本书中。佩恩的读本文章的选择和编辑上都别具匠心。他将格林布拉特的批评分为三个主要的部分:关于文化和新历史主义、文艺复兴研究、莎士比亚研究。这样的编排有利于让我们一窥格林布拉特批评实践的全貌。此外,读本的第四部分还收录

了格林布拉特关于故事讲述、奇迹之类的文章，意图回击认为新历史主义反文学、反审美价值的观点。读本的导言则是由孟特罗斯撰写的。他列举了新历史主义的十个特点，论述了格林布拉特的对新历史主义批评的论述以及他对于新历史主义的意义。

（二）国内新历史主义和格林布拉特研究概况及存在的问题

新历史主义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进入我国，在学界引起了一些注意，也有学者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但与其在美国独领风骚 30 多年相比，国内的研究还远没成为气候：与后殖民、女性主义等批评相比，格林布拉特和他所倡导的新历史主义批评似乎始终都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

陈厚诚和王宁在他们主编的《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①中提到，1988 年，王逢振在其撰写的《今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中，第一次向国内介绍了新历史主义批评。次年，韩加明的《新历史主义批评的兴起》概述了新历史主义的发展，杨正润的《文学研究的重新历史化——从新历史主义看当代西方文艺学的重大变革》则介绍了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实践，并概括了它的特色、贡献及弊病。1991 年，赵一凡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什么是新历史主义》，详细地介绍了新历史主义的来龙去脉。以上诸文为国内学者初步勾勒了新历史主义的轮廓。

1993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京媛主编的译文集《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该书以威瑟主编的《新历史主义》论文集为基础，同时还收录了其他几篇权威的新历史主义论文。同年 3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编辑了《文艺学和新历史主义》，精选了有代表性的五篇新历史主义文章加以翻译。另外，程锡麟、韩加明还翻译了海登·怀特 (Hayden White) 以及孟特罗斯的一些重要论文。这些成为后来国内研究新历史主义的主要参考。

在翻译、介绍新历史主义的同时，学者们也在探讨它的得失。1994

^① 陈厚诚、王宁编：《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

年,杨正润的两篇论文《主体的定位与协作功能——评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文学的“颠覆”和“遏制”——新历史主义的文学功能论和意识形态论述评》,分别从文学的发生和文学的功能两个层面对新历史主义进行剖析,将新历史主义理论中的矛盾暴露出来。同一年,韩加明的《新历史主义批评的发展及启示》回顾了新历史主义批评在中国文坛的发展历程及其传播影响,第一次具体论述了新历史主义批评对建设我国文学批评的意义问题。在认识新历史主义的偏颇和盲点方面,重要的文章有盛宁的《历史·文本·意识形态: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刍议》和《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历史真实》、王岳川《新历史主义的理论盲区》及钱中文的《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理论的前景》等。^①

目前国内在新历史主义方面的专著有两本:盛宁的《新历史主义》(1996年)和张进的《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2004年)。这两位学者也是目前国内对新历史主义研究关注相对较多的。盛宁的《新历史主义》是国内最早的专著,虽然写于20世纪90年代,但现在看来仍不失为对新历史主义论述最深的专著。本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的批判眼光,但可能也正是因为这种批判的眼光,而不能看到更多新历史主义为文学研究带来的更积极的一面。本书由台湾扬智出版社出版,在大陆没有版本,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它的影响力。另外,在1997年的《人文困惑与反思》中,盛宁又进一步将新历史主义放在后现代的大背景中进行思考,不过仍然秉持批判的眼光。而张进的《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则力图建立历史诗学,不过他所关注的更多的是历史诗学的理论层面,而对实际的批评操作关注不多。另外,王岳川在1999年的《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中也对新历史主义进行过论述。

国内对格林布拉特的研究,大多也是同对新历史主义的研究结合在

^① 这一部分关于新历史主义在中国的研究情况,参考了辛刚国的部分论述。见辛刚国:《新历史主义研究述评》,《学术月刊》2002年第8期,第111页。